

李仕根 ◎ 主编

四川抗战档案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是全国大后方，四川人民虽未遭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但也蒙受深重灾难。国仇家恨，激起了四川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众志成城，英勇抗日，四川人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抗战档案研究

主编 李仕根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四川抗战档案研究 / 李仕根主编. —成都：西南
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643-4178-7

I. ①四… II. ①李… III. ①抗日战争—档案资料—
研究—四川省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9161 号

四川抗战档案研究

主编 李仕根

责任编辑	王小碧
特邀编辑	李 鹏
封面设计	严春艳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 146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四川森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82 mm × 256 mm
印 张	16.25
字 数	410 千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4178-7
定 价	8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028-87600562

目 录

抗日战争期间四川人民的深重灾难与突出贡献	李仕根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有关抗战时期四川省档案的综述	马振犊 奚 霞	3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军工企业内迁述论	陆大钺	9
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抗战档案史料介绍	马小彬	20
从政治意识中心到国家权益中心：“七七事变”前中间性舆论对中苏关系的认识演变 ——以《大公报》、《申报》、《东方杂志》为视角的观察	陈廷湘	25
论中国开辟抗日西线战场的意义 ——兼评《李宗仁回忆录》中的一个观点	宁志一	41
抗日战争时期党加强先进性建设的历史经验	侯德邻	47
抗战前期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	刘君 徐学初	53
抗战时期中国西部开发的历史梗概	唐润明	67
关于四川抗战的几个问题	周文林	75
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先声 ——重庆民众自动收回王家沱租界斗争纪实	刘君 陈奇志	80
简述川军出川抗战	王晓春	85
川军抗战新论	赵永康	92
捐躯报国 英名不朽 ——抗日川军将领王铭章殉国前后	高 勇	98
男儿欲报国恩重 死到疆场是善终 ——记抗日烈士李家钰的前线历程	王成元	104
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对兵源和后勤的贡献	刘一民	107
抗日战争中四川农业政策及措施	刘志愚	114
兵力与粮食：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区人民在抗战中的主要贡献	杨玉林	119
抗战时期粮食调查统计工作论述	胡震亚	127
抗战时期自贡盐场增产赶运述略	沈 涛	134

抗战后期四川节约献金救国运动评述	陈翔	142
抗战时期四川节约献金救国运动	潘涯滨	147
日月并辉 永存不朽		
——从冯玉祥的亲笔信看自贡市的献金热潮	沈涛	153
抗战时期冯玉祥将军在隆昌发动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纪实	吴晓英	157
日机轰炸松潘事件始末	赵明强	160
铭记历史：日机轰炸成都纪实	车百灵	163
日机大轰炸下的四川城市人口疏散	张洁梅	168
日本飞机对南充城区的三次野蛮轰炸	侯文俸	171
铁的证据 血泪控诉		
——日机空袭阆中追记	寇永国	173
历史岂容篡改 暴虐注定失败		
——三台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片记	三台县档案局(馆)	176
内江与八年抗战	杨修武 甘德明	181
渠县抗日救亡运动综述	江正荣	194
勿忘国耻 壮烈千秋		
——通江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做的贡献	袁德华 谷继文	200
泸州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与牺牲	赵永康	206
火海护民卫士		
——记抗战时期的成都防护团	龚克 钱阳	214
巴人魂——追忆抗日战争中的宣汉儿女	向明均	217
重庆欢庆抗战胜利	罗永华	222
川西抗战“特种工程”	李泽民	228
南充的抗日救亡运动	胡剑	232
抗战期间的档案工作		
——以国民政府交通部为例	戚如高	238
抗战时期“马寅初被捕案”有关问题的辨析	孙大权	243
抗战时期全国金融中心的转移及其对四川经济的影响	张玉强	251
伪满洲国成立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三省邮政进行侵略活动的有关史实	李昌亚	254

其时之前日危长，汽尘翼帆，飞工帕帆各川。
遂燃特各帆其味萎虽，蒸酶器质而量大丁。
而贴革武，南齐橘耕林各丁，莫于天正燃各川四。

登卓苦聚牒计其强弱人固中。元美日0001
央帕加志众味帆谱帕服不避颠倒，牵牛帕
世武，音部好义王因革本日的夷凶下挂贴小
四，特重本朝工出湖麻制的分供谋西指因果

抗日战争期间四川人民的深重灾难与突出贡献

李仕根*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是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四川人民虽未遭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但也蒙受了深重的灾难。国恨家仇，激起了四川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众志成城，英勇抗日，四川人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惨遭日本大轰炸

四川人民损失巨大

根据四川省档案馆不够完整的档案资料记载，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至少出动飞机 7380 架次以上，对四川的 66 个市、县进行了至少 321 天的战略轰炸和扫射，投下的炸弹至少有 26 826 枚。遭到日本大轰炸的地区有重庆、成都、自贡、万县、奉节、合川、梁山、涪陵、泸县、乐山、温江、华阳、新津、崇庆、新都、双流、内江、简阳、永川、巴县、綦江、璧山、铜梁、北碚、峨眉、宜宾、隆昌、富顺、合江、纳溪、丰都、南川、秀山、开县、忠县、巫山、巫溪、云阳、城口、大竹、渠县、广安、长寿、南充、南部、武胜、遂宁、三台、蓬溪、盐亭、绵阳、金堂、梓潼、苍溪、广元、阆中、达县、松潘、新繁、荣县、荣昌、眉山、夹江、屏山、江安、中江等 66 个市、县，给四川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据民国四川省政府统计处汇核统计，1938—1944 年的 7 年间，除 1942 年四川未

遭轰炸外，其余 6 年都遭到过日本飞机的大轰炸。四川民众被炸伤 26 000 余人，被炸死 22 500 余人。特别是 1939 年、1940 年和 1941 年，日本实行大轰炸最为猖狂，四川民众伤亡惨重，被炸伤 25 600 人，被炸死 22 300 余人。重庆市先后遭到 69 天的大轰炸，伤亡尤其惨重，有 1 万多人被炸伤，有上万人被炸死，尸骨遍地，惨不忍睹！日本对四川的大轰炸，造成了民众巨额的财产损失。民国四川省政府统计处依据 58 个市、县呈报的财产损失项目统计，被炸毁的房屋有 23.32 万余间，炸毁衣服 34.6 万余件，炸死牲畜 2100 余头，炸毁粮食 3.47 万余石，炸毁田园 80 余亩、树木 1.82 万余株，炸毁汽车 60 余辆、人力车 140 余辆、木船 3500 余艘、汽船 13 艘、什物 97.59 万余件，损失现金 7729.8 万余元。以上人口伤亡所用医药费和埋葬费以及各项财产损失，按照 1945 年的物价指数折算，至少损失 1500.64 亿元。这还不包括遭轰炸的新繁、荣县、荣昌、眉山、夹江、屏山、江安、中江 8 县市的损失以及全省各项公有财产的损失。

四川人民英勇抗日 贡献突出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 2254 万人以上，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到

* 李仕根，四川省档案局局长。

1000亿美元。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和众志成城的决心战胜了凶残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抗日，贡献突出，主要表现为“四出”。

一是出兵出将。抗日战争期间，四川出兵总计约340万人。抗日战争爆发后，40多万川军开赴前线浴血奋战。抗战八年，四川征募兵员260多万人，其他各种渠道征兵约40万人。征兵数量占全国的20%以上。川军在抗日战争中伤亡64.6万余人，约占国民党军队伤亡人数的20%。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中，都有一批杰出的川籍人士担任高级将领。如八路军总指挥朱德、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115师副师长聂荣臻、129师师长刘伯承、新四军军长陈毅，国民党军队将领李家钰、王铭章、饶国华等人，都是杰出的抗日将领和民族英雄。

二是出钱。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大部分省市沦陷，民国政府的财政开支主要靠四川。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四川承担了民国政府50%的财政支出。八年抗战民国政府总支出为14640余亿元（法币），四川负担了约4400亿元，占30%以上。

三是出物资。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四川粮食生产还不足以满足本省4000多万人用粮的需求，但是为了保障抗日军粮的供应，四川人民节衣缩食，交纳了沉重的田赋。1941—1945年，四川田赋共征收谷物8408万石，占全国征收谷物总量的1/3以上。四

川各地的工厂，加紧生产，为抗日前线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服装和其他各种物资。四川各地还开展了各种捐献活动，为抗战捐钱、捐衣、捐飞机。

四是出力。为了保障抗战运输通畅，四川动员250万民工抢修川陕、川黔、川滇、川湘四条公路干线。民工们用锤子、锄头、扁担等简陋工具开山劈岭，挖土运石，昼夜赶修，付出了大量艰苦的劳动，在1940年开通了这四条公路干线。抗战期间，四川新建扩建空军基地33处，也动用了大量的民工。1943年12月，为了紧急修建和扩建新津、邛崃、彭山、广汉4个战略轰炸机场和5个驱逐机场，四川动员了29个县50余万民工抓紧施工，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修建任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四川省档案馆保存有45.2万卷民国时期的档案。这些档案记录了四川抗日战争的历史。战争给四川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那是一段刻骨铭心不堪回首的血泪史！战争中也显示了勤劳勇敢的四川人民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大义凛然、同仇敌忾、吃苦耐劳、临危不惧、顽强拼搏、决战决胜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是任何侵略者都无法征服的！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那段苦难的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珍视和平，开创未来，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我们要正告日本右翼势力，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梦想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别的国家，是注定要失败的！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有关抗战时期四川省档案的综述

马振犊 奚 霞*

天府之国四川，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是我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四川，以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在抗战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民政府一方面加强对四川的统治，一方面采取措施开发四川的经济和交通，促使四川战时经济得以发展，成为国民政府抗战的财源基地、物资基地和兵源基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四川省抗战时期的大量档案，内容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一幅战时四川的全景图，是研究抗战和四川历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下面从两方面作一介绍。

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

八年抗战，四川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各地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档案中记载较多的有：

1. 抗日救亡团体的普遍建立。原有的抗日救亡团体由秘密转为公开，而且新成立了不少大型的抗日救亡团体。如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成都各界抗敌后援会、四川学生救国联合会、四川妇女抗敌后援会、四川青年救国会、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等。各抗

日救亡团体组织歌咏队、戏剧队、演讲队、壁报队等抗战文艺团体，如自贡话剧歌咏团、宜宾抗敌剧团等，深入街巷、工厂、学校、农村、工地、山寨，宣传抗战。有的抗日救亡团体还创办了刊物，如，成都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先后创办了《大声周刊》、《图存周刊》和《星芒周刊》，四川青年救国会创办了《救亡周刊》，四川妇女抗敌后援会创办了《妇女呼声》等。

当时在四川全省都设有分会的四川抗战建国协进会，以“发动全川力量，拥护抗战政策，建设新四川”为宗旨，呼吁和平，反对战争。在协助政府进行抗敌宣传、提出各种建议和主张、鼓励民众参战、救护伤兵、安抚难民、改良风俗等方面做了许多事情。下属各委员会分专题研究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民众运动等问题，在大小报刊上发表文章。如1938年的《会务特刊》，总结了抗战初期失败的惨痛教训，指出由于政府忽视了民众的重要性，才导致军事上的失败。该刊写道：“而仅四川一省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就与日本的土地和人口相当，所以我们万不可苟且偷安，自暴自弃，只要广泛发动民众，使每个民众都成为战斗的一员，就一定能打败日本的坚甲利兵。”

*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奚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员。

2. 四川是抗战的主要兵源基地。据档案记载，先后出川开赴前线的川军有40万人，编为6个集团军另两个军、一个独立旅。此外，四川每年还向前线输送10到30万名壮丁，成为全国最大的兵源省份。当时四川人口不过5000多万，8年中有约350万人出川抗战，也就是说，每十五六个四川人中就有1人上前线，全国抗日军人中，每五六个就有1个四川壮丁，以致有“无川不成军”之说。据统计，抗战八年，川军牺牲巨大，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五分之一，总计阵亡26万人、负伤35万人、失踪2万人，总计64万人，这一数字又居全国各省之冠。

在抗战最艰苦的1943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四川在1个月内征集4.5万名知识青年当兵，开赴印缅前线补充远征军。四川大批大中学生和公教人员群情激昂，“泣请从军”，很快就有4万多人奔赴前线。11月，国民政府发起“学生志愿从军运动”，到12月底，全省又征集从军知识青年1.8万人，先后奔赴印缅，配合盟军对日作战。关于四川征兵机构的组织与沿革，征兵制度的建立、贯彻和执行情况，以及征属优抚、兵役弊政和群众反抗等，在馆藏档案中都有详细记载。

3. 日机轰炸和成渝两市的反轰炸斗争。在整个抗战时期，四川是日军轰炸的重点，历时六年多的轰炸，给四川带来了巨大损失。但四川人民不畏强暴，坚持进行了反空袭斗争，档案中对此有较多的记载：在政府方面，建立了由省及各市政府、保安处、警备部、特务团、宪兵团和航务处组成的防空指挥部，组建高射炮队，设立防空监视哨、情报班和听音机，实施交通、灯火管制；整顿消防队，成立工务队，给所有军事机关工作人员配置防毒面具，还增加防空设备，组织空袭救护队和流动医疗队，对轰炸现场进行消防、救灾和设置难民收容所，赈济受灾

民众；记录空袭各地的经过情况和统计带来的巨大损失，包括飞机架次、投弹种类数量、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等。

4. 档案中有许多反映四川人民反特抗暴斗争的资料，完整记录了一些闻名全国的重大事件，如震惊川西的“郫县事件”和成都“抢米事件”。1938年，郫县政府派警察把刚到该县的成都“群力抗敌宣传社”人员扣留在旅馆里，称他们在新繁宣传和散发标语中有破坏抗战、煽动罢市的言论，不准他们上街宣传，并把他们武装押回成都，交给省政府处理。“群力社”宣传队员据理力争，声言抗日无罪、爱国有理，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表示支持。由于奸商发国难财，囤积居奇，使法币贬值，米价飞涨，饥民买不到米，不时发生“抢锅盔”、“吃大户”的事。1940年3月14日晚，成都行辕指使特务收买地痞流氓，砸开潘文华所属重庆银行的仓库大门，怂恿老百姓去抢米。特务则诬称是共产党发生暴动，逮捕了共产党员罗世文、车耀先等十多人，最后加以杀害。

此外，关于前方部队的阵中日记、整训日记和战斗详报，民众踊跃参战，献金献物，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筹购军粮，各团体慰问抗日将士，反对汉奸组织，对抗战损失进行调查统计等，档案中都有详细记载。

四川地方建设的蓬勃发展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促进了四川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档案是真实记录这一发展变化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战时四川历史，无疑具有巨大的价值。下面从三方面作一介绍。

1. 政治方面。抗战时期，四川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这在档案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此时期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的档案数量明显增加，其中除了有反映四川地方党政机构贯彻国民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经过和执行结果外，还有其自行制

定的各种法令法规、规章制度和贯彻执行情况，以及各职能部门的工作计划、报告、总结等，如关于政府各主要部门的机构沿革、人事更迭、方针政策、施政计划、会议记录、法令法规、规章制度、各级组织纲要、来往函电、调查报告等。它们是研究抗战时各立档单位的机构沿革、人事变迁、工作概况等的宝贵资料。

国民政府迁渝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治集团与四川地方实力派继续进行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这在档案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如，1938年四川省主席刘湘率部出川抗战病死后，蒋介石即任命亲信张群为四川省主席，遭到刘湘在川部队将领的反对，17名师长联名致电蒋介石，拒绝张群来川，并组织人员在全城遍贴反张标语，举行示威游行，迫使蒋介石采取缓冲办法，电令四川省秘书长邓汉祥在张群到任前照旧负责，并对彭焕章等将领进行安抚：“刘故主席部属即中正之部属，决一视同仁，希各安心。”

《四川省施政纲要》是1939年蒋介石兼理川政两个月后亲手制定的，内容包括治安与剿匪、禁烟、地方自治、吏治、财政金融、地政、卫生、经济建设和教育，共9项28条。这些措施的执行，加强了蒋介石对四川的统治。

推行新县制，加强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对农村基层实行统治的重要手段。1939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蒋介石令四川省率先实施，以树全国改革县政之先声。四川省政府随后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实施计划》，规定“县为地方自治单位，区为县政府的辅助机关，县以下各乡（镇）建立保甲制度。县长必须是国民党员，乡（镇）长、保长必须经训练及格者才能充任。乡（镇）、保长兼各该级国民兵团队长和乡（镇）中心学校、国民学校校长”，并且实行保甲连坐法。各地举办了行政干部、兵役干部、民运干部训练班，对县、乡（镇）行政

机构进行改组，使乡（镇）、保长成为党政、武、文“几位一体”的统治者，从而加强了政府的统治。新县制的实行，使四川的地方行政系统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与国民党的中央党政系统相适应并且一体化了。

2. 经济方面。这部分档案内容十分丰富，几乎涉及到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财政金融、工矿企业、邮电交通和商贸档案保存最为完整、最具特色和最有利用价值。

（1）财政。1942年四川财政改革后，省级财政被并入国家财政，县级财政成为地方自治财政系统，上升为四川财政的中坚，担负着支撑地方政府开支、协同中央开发四川经济、支援抗战的重任。从档案记载中可看出，当时的主要财政收入以田赋、税收和债款为大宗。政府采取了加强财政管制，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并缩小不必要开支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和促进了后方经济的发展，支撑了抗战大局。如进行税制改革，继续用增发通货来弥补财政赤字，积极发行公债，控制信贷和加强银行管制、鼓励储蓄等。抗战八年，四川担负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而战时粮食奇缺，全川物价暴涨，从1942年12月到1943年1月，仅一个月里成都米价就上涨了3倍。粮、糖、盐、火柴等也都限量供应，几千万四川民众挣扎在饥寒线上，可见四川人民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2）金融。战时四川金融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国家银行、省内地方银行和一般商业银行的快速发展。中中交农四行在四川设的分支处就有67所；县银行也发展迅速，1943年有65家，占国统区县银行的40%，1943年则膨胀到97家。由于工业贷款剧增，以及商业投机和物价飞涨的刺激，银行业迅速发达起来。我馆所藏中央一级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各川帮银行、外省西迁各

著名银行以及新成立银行和钱庄的档案极其丰富，它们全面记录了财政金融的法令法规、方针政策，各银行的组织章程和人员更迭、资本构成及其变化、经营管理的投资策略、金融危机及解决办法，以及不同时期币制、利率、汇率的变化情况等。其中的许多内容不仅弥补了战前有关四川部分的档案的不足，而且还远远超出了金融本身的范畴和四川的地理界限，涉及到抗战时全国各地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以聚兴诚银行为代表的川帮银行在全国各重要地区，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汉口等地所设分行，为开展业务，对各城市及周边地区所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情况的调查报告，不仅是研究金融发展变化的重要史料，而且对研究各城市战时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3) 工业。1938—1941 年是四川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之所以有这种跳跃式的发展，主要是因为大批工厂内迁，战时对工业物资的需求大大增加，以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扶持和奖励政策。它不仅保证了军需民用，而且为我国近代工业奠定了基础。到 1940 年，华东和华中的 250 多家工厂迁入四川，大量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兴办工业，兵器、化学、冶金、机械、电力等工业部门形成了相当的生产能力。自贡盐业、内江食糖、南充丝绸的生产一时空前繁荣。适度的通货膨胀刺激了工厂的生产，许多企业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档案全面记录了各生产厂家的组织规程、办事细则、人员编制、工厂沿革、厂务会议、生产计划、生产情况、生产品种、生产数量等，其中以钢铁、机械、能源、军工、纺织、化学工业的资料最为完整丰富。

在工业经济发展中，以工业技术进步最为显著。战前我国几乎所有重要工具、生产资料都必须依赖国外进口；战时后方的工业技术一方面因被切断了外援，只能自力更

生，另一方面战时对军需民用品的需求十分强烈，迫使企业必须以仿造、改良和发明新产品为努力方向。在经济部报告《抗战六年 来之我国工业技术之进步》一文对核准的专利权统计中就可以看出，1938—1943 年为 338 项，而自民国成立到 1937 年的 20 多年间，总共不过 257 项。由此看来可算是空前的发展了。

(4) 农业。政府通过采取增加农业投资、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品种、推广农业科技、发放农贷等措施，使四川农业有了很大发展。档案中详细记载了政府颁布各种法令，对土地的利用进行调整，规定减种烟草、糯稻等非必需品，改种战时必需的粮食作物，利用荒隙地和冬夏闲地，推广冬耕、双季稻、再生稻，使粮棉、油菜籽、甘蔗等经济作物产量大幅增长。为了推广农业改良技术，各地建立了农业推广所和试验场。农村手工纺织业、土法制糖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这可以从经济部统计处对合作社发展情况、农村生产贷款、土地利用收益、谷麦、棉花生产量、佃农购置耕地的统计资料中，看出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趋势和规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八年抗战，四川提供的粮食是最多的，前后方所需的粮食主要靠四川供给。省政府一面制定政策，奖励农垦，增产粮食；一面号召节约，甚至实行一日两餐。1941 年成立田赋管理处后，实行田赋征实、征购，采取“两元并用”、“征购平摊”的办法，分摊各县，并落实到占有田地的各纳粮户，限期交纳。为了严惩囤积居奇者，省政府通令，凡从事非法交易者，一律“处以极刑”，如成都市长杨全宇就因囤积大量粮食被敲了“沙罐”（脑袋）。

(5) 交通。在经济建设的推动下，交通运输有了很大发展，水运、公路、航空和邮电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这在《抗战时期迁都重庆之交通部》一文中有详细的阐述。它从行政、建设、业务、器材、复员、

战时损失几方面，全面介绍了交通部的内迁过程，迁移后实施行政“三联制”，修建和改善公路、铁路，开辟水陆空联运和国际邮运，建设电信线路和中印油管，培养人才，制定技术标准和统计战时损失，以及还都时办理善后事宜，开展接收和重建工作的情况。从档案中可见，为了扩大内河水运，政府对四川水运干线和重要水道进行了较大范围的整治，使川江水运在内迁、运送川军出川抗日、抢运伤兵和难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修筑了川黔、川湘、川陕、川鄂、川滇（西路、东路）六大公路干线，形成了四川公路网，使公路通车里程较战前增加了1倍。

1943—1944年，根据盟军对日作战计划，要在新津、邛崃、彭山、广汉修建4个大型轰炸机场，在成都、温江、德阳等地扩建、新建5个战斗机场。为此，四川29个县的50万民工投入机场建设。在没有任何机械施工设备的条件下，民工们肩挑手抬，流血出汗，连妇女和儿童也加入了劳动者的行列，半年就完成了修建任务。档案中对工程的组织、经费、建造过程、民工调配等的记载非常详细。

(6) 商业。战时四川的商业行业明显增多，扩大了经营范围，企业和地区间的联系大大加强。档案中大量记载了在实行统制政策后，对重要商品如粮、棉、丝、桐油、猪鬃、钨、锑、锡等实行统购统销，对生活必需品如食盐、食糖、烟、火柴等实行专卖的情况。1943年政府颁布了《加强物价管制方案》，规定对军需和民用物品中的重要物品实行限价，严禁黑市买卖，对非限价物品则实行议价。这些措施对保证军需物资的供给和人民基本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 文化、教育、社会方面。抗战时期四川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国内知名作家、学者、科学家皆汇集于此。教育事业也呈现一时的兴旺局面，四川当时成为全国教育最发

达的省份。由于占全国近一半数量高校的迁入，加上其原有高校，使四川的高校一时多达57所，为战前的14倍，居全国之首。中小学也达到了战前的2~3倍。有关这部分的档案很完整，从中可详细了解省内各大中小学校的历史沿革、组织情况、教学计划、学校经费、教职员名单、学生名册、课程设置、教育纠纷、招生工作、收容战区学生、大学间开展技术合作与学术交流等。

战时四川报刊林立，种类繁多，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各报刊都把团结抗战作为宣传的主题，面向社会，提倡大众化和通俗化。比如，使宣传的道理通俗易懂，发表的文章短小精悍，内容文字大众化。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各报刊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力求办出自己的特色，在篇幅、版式、编排上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如，在成都就办出了一批像《星芒报》、《蜀话报》、《通俗文艺》那样“又通俗又有趣”、“又好懂又相因”的小报。

另外，档案中还有许多反映四川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的资料，全方位、多角度地勾勒出了四川的社会概貌，如土地、人口、民族、宗教、风俗、帮会、赈济等。这些资料对研究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巨变，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在当前越来越重视社会变迁和区域发展史的研究，而当时报刊史料反映此类事件缺乏的情况下，这些档案的利用、研究价值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当然，我馆所藏的战时四川档案，不仅反映了四川省社会生活在抗战初、中期出现的改善局面，也如实反映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多种积弊、当政者的腐朽，特别是抗战后期国统区政治经济迅速衰落的现实。如，国民政府不顾市场经济规律而一味采取行政手段实行统制政策，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扼杀了民营企业的生机与活力；由于气候、水利、人为的指导与调剂不足等原因，农业收成连年递减；由于滥发纸币，引起恶

性通货膨胀，造成金融市场紊乱、商业投机泛滥、物价暴涨，许多工厂、商行倒闭；交通除空运外基本断绝，使对外商贸渠道受阻；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垄断物品、操纵市场的现象屡见不鲜，以及在社会生活方面种种丑恶的现象。国民党不顾民族危难，坚持反共政策，推行特务统治和片面的抗战路线，造成了抗战正面战场上的连续失败，这些在档案中都有明确的记录。

总之，对于研究抗战历史和战时的四川

经济、社会、政治等全面情况来说，我馆所藏的四川抗战档案，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史料财富，对于这座“富矿”的发掘与开采，还需档案界与史学界同行们的共同努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热烈欢迎并期待与兄弟馆及史学界专家学者、社会各方面有志之士合作，共同致力于有关史料的发掘、整理，利用与出版，让保藏于库房中的档案，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军工企业内迁述论

陆大钺*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主要的兵器生产企业在抗战爆发前均分布在容易受敌攻击的东部地区。随着战事的发展，绝大多数军工企业所在地相继沦陷。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从1937年9月起至1940年秋，我国各军工企业纷纷投入内迁大后方的壮举之中。本文就此次内迁壮举的来龙去脉、内迁过程中兵工厂署对军工企业的调整、内迁结束时我国兵器工业的新布局、军工内迁壮举的意义，作一比较全面的论述。

抗战爆发时 我国兵器工业的实力

1937年抗战爆发时，我国有械弹出品的专业兵工厂主要有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上海炼钢厂、巩县兵工厂、金陵兵工厂、济南兵工厂、巩县兵工厂分厂、炮兵技术研究处（亦称株洲兵工厂）、广东第一兵工厂、广东第二兵工厂、广东化学厂、广西第一兵工厂筹备处（由柳州制弹厂、南宁第一机械厂、南宁第二机械厂、南宁第三机械厂等桂系各兵工厂合并而成）、四川第一兵工厂（即原川康绥靖公署子弹厂）、重庆电力炼钢厂、太原兵工厂、沈阳兵工厂等16家。上述各厂如简单分类，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九一八”事变前所建之老厂；二是“九一八”事变后的新建厂；三是原为地方实力派

控制、抗战爆发前后为国民政府接收统筹之各厂。^[1]

其中第一大类主要有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上海炼钢厂、巩县兵工厂、金陵兵工厂、济南兵工厂等6家。这一类兵工厂，除巩县兵工厂创设于民国初年外，其余均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洋务派所创建，其历史悠久，设备陈旧，但经“九一八”事变后的整理扩充，情形有所好转。

第二大类主要有炮兵技术研究处（株洲兵工厂）和巩县兵工厂分厂两家。这一类兵工厂因建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所以设备较好，产品具有一定的对日大战的针对性。

第三大类主要有广东第一兵工厂、广东化学厂、广东第二兵工厂、广西兵工厂筹备处、四川第一兵工厂、重庆电力炼钢厂、太原兵工厂、沈阳兵工厂等8家。这一类厂原为地方实力派所控制，游离于中央统筹范围之外。由于各地地方实力派视兵权如命，因而对兵器制造也高度重视，所以上述各厂的机器性能、生产能力并不逊于中央控制各厂。抗战爆发前后，这类厂除沈阳兵工厂早为日军控制、太原兵工厂在抗战爆发初期毁于战火之外，其余6厂均陆续为国民政府接收统筹，成为我国战时重要的国防力量。^[2]

所以，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实际掌握并可充作国防实力的兵器制造厂家，只有14家。它们均归口于军政部兵工署。其区

* 陆大钺，重庆市档案局局长、副研究馆员。

域分布大体是：广东 3 家，河南、武汉、重庆各 2 家，山东、湖南、广西、南京、上海各 1 家。其产品有仿造德国一九二四式之步枪、仿造捷克式之轻机枪、仿造德国马克沁式之重机枪、仿造法国勃朗特式之八二迫击炮、各式枪弹、自 7.5 厘米至 15 厘米的各式炮弹、自 10 公斤至 1000 公斤之各式飞机炸弹及手榴弹、毒气弹、燃烧弹、照明弹等。此外，“各式炮弹所用之钢，均系自炼”，“炮弹及炸弹用之各项信管，均系自造”，“化学品之研究颇有成绩，防毒面具之制造，亦大有成功，已可大量制造”。^[3]

这就是抗战爆发时我国兵器工业的大致实力。

战时兵工内迁壮举之序幕 (1937 年 9 月至 11 月)

根据上文所述，很显然，抗战爆发时我国兵器工业的主要生产厂家，除位于重庆等少数西部地区的兵工厂从位置上讲相对安全外，几乎全部处于沿海或靠近战区。这样，在抗战爆发后，这些沿海或靠近战区的兵工厂立即受到战争的威胁。为保存我国的军工实力，以利持久抗战，我国各主要兵工厂便开始了战略性的大移动。

战时兵器生产企业应置于国防安全地带，这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兵工署就已经提出。以 1935 年 6 月 5 日蒋介石致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电，指示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尽量设法改运川黔两厂为标志，我国兵器工业将在总根据地建立新的生产中心的方针，在战前也已基本确立。^[4]然而，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未雨绸缪的实际举措并不够理想，与整个抗战处于仓促应战的状况相吻合，兵器工业具体内迁政策的制定及总根据地兵工中心的建立，都是在抗战爆发后才进行的。

抗战爆发后，全国军民空前团结。“一时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气象。”此时，国民

政府对日作战的布局是：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而以四川等地为核心，努力构筑广阔的大后方。根据上述方针，并使兵器工业的发展跟上战争的需要，兵工署在抗战爆发后对兵工企业的地域布局作出了如下的构思：利用兵工内迁，一方面，在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建立我国新的兵工生产中心，以利长期抗战；一方面，为配合前方作战需要，积极实施“三阳”战略，^[5]即以洛阳、汉阳、衡阳为中心，分别建立临近战区的兵工生产点。

为了实施这一构思，兵工署于抗战一爆发，即派遣技术司司长杨继曾立即率团入川，勘察可供各兵工厂迁建之地点，同时调查綦江铁矿和南桐煤矿，策划利用重庆附近之煤铁资源，建设大型钢铁厂，以求战时兵工钢铁原料之自给。^[6]

随着沪宁会战的展开及华北战区的扩大，位于沪宁及华北的上海炼钢厂、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厂、巩县兵工分厂、济南兵工厂等兵工生产单位，立即处于危急状态。为了保存军工实力，兵工署首先对上述各厂颁发了迁厂计划。其中 1937 年 9 月得到迁厂令的有上海炼钢厂、济南兵工厂及金陵兵工厂之枪弹厂。同年 11 月，战事进一步恶化，于是金陵兵工厂全部、巩县兵工厂、巩县兵工分厂又奉命迁移。这样，国民政府兵工生产单位中的上海炼钢厂、巩县兵工厂、巩县兵工分厂、济南兵工厂、金陵兵工厂等五厂首先内迁，拉开了我国抗战时期军工大迁移壮举的序幕。

上述各厂的内迁时间、地点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出该期军工内迁的主要特点。

第一，从内迁的范围看，仅限于直接受敌威胁并处于准备战略撤出地区之各厂。战争爆发后，械弹大量消耗，截至南京失陷，由军政部及后方勤务部向各参战部队经发的

表 1

厂名	迁往地点	迁移时间	备注
上海炼钢厂	汉阳	1937年9月	
济南兵工厂	西安	1937年9月	
巩县兵工厂	湖南长沙	1937年11月	
金陵兵工厂	重庆	1937年11月	枪弹厂于9月先迁重庆
巩县兵工厂分厂	四川泸县	1937年11月	

弹药，仅步、机枪弹一项，就达二万万发以上。^[7]这给兵工署造成很大的压力。因此，兵工署一方面严令各兵工厂“维持现有工作，且须增加效率至最高限度”；同时，又考虑到“倘事迁移，势必旷日费时”，所以又严令“各厂非不得已，不作迁移之举”。^[8]有的厂，如广东的三个厂，已经属于日机轰炸的重要目标，个别厂甚至已不能正常工作，兵工署为增加出品供应前线，仍严令坚持生产。这是此期兵工业企业内迁牵涉面不大的主要原因。第二，从内迁的时间看，兵工业企业迁移时间又晚于8月已经掀起的我国沿海民营企业的内迁浪潮，多数是在临近驻地沦陷时才撤出。如金陵兵工厂迟至1937年11月15日才得到迁移令，最后一批器材和员工直到1937年12月7日才离开南京，而此时离南京沦陷仅几天时间。

第三，从迁往地点看，基本上是兵工署提出的在大后方建立新的兵工生产中心和“三阳战略”的初步实践。金陵兵工厂和巩县兵工厂分厂是国民政府设备先进、产品相对精良的骨干厂，迁到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总根据地，以利实力的保存。另外三厂则分迁“三阳”地区附近。

尽管兵工业企业内迁时间晚，但是，此期兵工业企业内迁的迁移条件，又明显优于民营企业的内迁。首先是组织协调上，为了帮助各厂迁移转运，并尽快办妥租赁办公用房、察勘厂址、提卸各厂运输器材觅地存放，并代办迁移各厂对外联络事项，兵工署于

1937年9月10日决定组设重庆、长沙、西安、香港（主要负责采购兵工原料、转运进口机器设备等事项）四个办事处，并分派胡蔚、庄权、刘楚材、方兆铭为各该处处长。^[9]同时，为方便督促迁移中的运输问题，兵工署又于同年11月组设了驻芜湖临时办事处和驻宜昌运输处等机构，分担联系交通工具、督导迁运事宜。其次，政府利用掌握的运输手段对兵工厂迁移大开绿灯，各民营运输公司也予以大力协助。如，著名的民生轮船公司，光兵工署重庆办事处与之联系签约的第一批运输物品，就达14 000吨。^[10]

战时兵工内迁壮举之高潮 (1937年12月至1938年11月)

1937年12月12日，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失陷。在此之前的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宣告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11]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在南京各机关逐步向西迁移。而在南京失陷后，日本的态度愈益强硬。1938年1月16日，日本内阁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宣称“帝国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同月18日，日本政府又发表补充声明，进一步强调，“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权更为强硬”，它的意义在于“在否认国民政府的同

时，将它彻底抹杀掉”。在这种被侮辱殆尽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唯有决战到底之一途。于是，战争以更大的规模，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而在战争的进程中，我国的沦陷区也不断扩大，大批兵工生产企业因此也受到更为严重的威胁，从而继前期局部兵工内迁之后，又迎来了规模更大、牵涉面更广的兵工内迁壮举的高潮。

此期内迁，以广东各厂首开先河。为了封锁中国南方物资输入线，日本陆军很早就提出了在广东大亚湾登陆作战的设想，但由于战线太长，运输困难、补给不易，加上日军主力陷于沪宁、华北诸战场，所以广东会战迟至 1938 年 9 月才进行。但是，在全面战争爆发不久，日军就利用停滞在南海海面上的航空母舰，频频出动飞机，对广东的重要军事目标、兵工业企业进行大肆轰炸。1937 年 7 月 27 日，广东第二兵工厂遭敌机 9 架轰炸，之后，“空袭频仍，几无宁晷”。由于缺乏防空设备，该厂自日机轰炸以来，实际已无法正常开工。广东其他两厂的情况大致相同。基于此，兵工署首先于 1937 年 12 月对广东第一兵工厂颁发迁厂令。1938 年 4 月初，又分别对广东第二兵工厂、广东化学厂下达内迁命令。

1938 年 4 月上旬，正当日军在为打通津浦铁路而发动徐州战役的同时，日本大本营就已着手研究武汉作战方案。此后，由于徐州的失守，武汉失去屏障，蒋介石失去了保卫武汉的信心。1938 年 6 月 9 日，蒋介石发表声明，宣称当前战局的重点不是在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防御成功与否，今后的作战要在山岳地带进行。同日，蒋还下令在武汉的党政机关、大专院校等，可以开始向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转移。这样，兵工署的“三阳”战略已无法实施。于是，被迫形成了新的兵工战略，这就是：将相对先进的设备和出品相对精良的兵工厂，一律迁往重庆或重庆附近；在大后方的湘、桂、黔、滇也适当布点；同时，放弃在汉阳、洛阳一带建立兵工生产中心点的构想，但不放弃在株洲、衡阳一带建立前方兵工生产中心点，以便及时给前方以械弹补充。

这样，在武汉沦陷前，驻汉各兵工厂及兵工署的各有关单位，统统跨入兵工内迁行列。从广东三个厂的迁移开始，至 1938 年夏季武汉各厂的迁移，及同年 11 月广西第一兵工厂的迁重庆为终端，形成了我国抗战时期兵工内迁的高潮。

此期兵工内迁的概况大致如表 2 所示。

表 2

厂名	迁移时间	迁往地点	备注
广东第一兵工厂	1937 年 12 月	广西融县	
广东第二兵工厂	1938 年 4 月	重庆	
广东面具厂	1938 年 4 月	贵州遵义	即广东化学厂
济南兵工厂	1938 年 4 月	重庆	前期由济南迁西安，此期属再次迁移
汉阳火药厂	1938 年 5 月	湖南辰谿	
汉阳兵工厂	1938 年 6 月	湖南辰谿	
钢铁厂迁建委员会	1938 年 6 月	重庆	1938 年新成立于汉阳
上海炼钢厂	1938 年 8 月	重庆	前期由上海迁汉阳，此期属再次迁移
广西第一兵工厂	1938 年 11 月	重庆近郊綦江县	